



古希伯来文学史

朱维之 主编 梁工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 编 朱维之
副主编 梁 工

古希伯来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伯来文学史 / 朱维之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4

ISBN 7-04-009827-X

I. 古… II. 朱… III. 文学史—希伯来 IV. I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14 号

古希伯来文学史

朱维之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4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袁晓波 汤 悦
于文燕
周顺银
马桂兰
陈伟光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希伯来文化与中国文化	(1)
第二节	希伯来文学史鸟瞰	(8)
第三节	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15)
第二章	最初的文学:人民口头创作	(24)
第一节	概述	(24)
第二节	神话	(28)
第三节	传说	(35)
第四节	出埃及史诗	(41)
第五节	早期歌谣和抒情诗	(51)
第三章	前王国时代的文学	(55)
第一节	概述	(55)
第二节	攻占迦南史诗	(57)
第三节	士师们的故事	(61)

第四章 王国时代的文学 (69)

- 第一节 概述 (69)
- 第二节 五经 J、E 底本的编著 (73)
- 第三节 申命派史书的形成和特色 (77)
- 第四节 传记文学的丰收 (82)
- 第五节 抒情诗的繁荣 (88)
- 第六节 智慧文学的兴起 (97)

第五章 先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105)

- 第一节 何谓“先知” (105)
- 第二节 先知文学的特色 (110)
- 第三节 先知文学的内容和影响 (114)
- 第四节 公元前 8 世纪的先知文学 (119)
- 第五节 公元前 7 世纪的先知文学 (130)

第六章 亡国与俘囚时代的文学 (139)

- 第一节 概述 (139)
- 第二节 亡国前后的先知文学 (142)
- 第三节 亡国前后的抒情诗 (153)
- 第四节 俘囚时代的智慧文学 (160)

第七章 复国时代的文学 (167)

- 第一节 概述 (167)
- 第二节 祭司派作者的贡献 (171)
- 第三节 复国时代的先知文学 (179)
- 第四节 短篇小说的成熟 (191)
- 第五节 抒情诗的创作和编订 (200)
- 第六节 智慧文学的新发展 (205)

第八章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上) (211)

- 第一节 概述 (211)

第二节 宗教抒情诗 (217)

第三节 爱情诗集《雅歌》 (226)

第四节 小说和民间故事 (233)

第九章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下) (252)

第一节 史传文学和讲演词 (252)

第二节 希腊化时代的智慧文学 (262)

第三节 末后的文类:启示文学 (274)

第十章 《塔木德》文学 (285)

第一节 《塔木德》产生的背景 (285)

第二节 《塔木德》的成书 (288)

第三节 《塔木德》的主要内容 (294)

第四节 《塔木德》的文学特色 (312)

附 录 (326)

缩略语对照表 (326)

古希伯来文学年表 (327)

后 记 (33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希伯来文化与中国文化

提起希伯来文化,首先应对“希伯来”等相关概念有所了解。希伯来人本是闪族(Semite)的一支,最初游牧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地区。公元前3、2千纪之交,他们逐水草而居,迁至两河流域南部的名城吾珥一带。公元前1800年左右他们再次迁徙,在传说中的族长亚伯拉罕带领下,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迦南地区(即今巴勒斯坦)。相传迦南土著居民称他们为“希伯来”(Hebrew),意谓“从河那边来的人”。后来,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与化身为人的上帝摔跤,不分胜负,上帝赐名他为“以色列”(Israel),意谓“他与上帝较力”(参见《创世记》第32章)。以色列娶了二妻二妾,她们生养了12个儿子,他们的子孙被统称为以色列人,此即以色列人的12支派(以色列人有时也特指分国时期的北国人)。以色列的第四个儿子名犹大(Judah),他的后代是犹大支派,亦称“犹大人”(犹大人有时又特指分国时期的南国人)。至于“犹太人”(Jew),此

称呼出现最晚,是“犹太”一词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译名,起初是希腊人、罗马人对希伯来人的蔑称,始用于“巴比伦之囚”事件之后,公元2世纪后逐渐在世界各地通用,逐渐不再带有贬义。总之,按历史先后的不同,希伯来人又可称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和犹太人。不过现在“犹太人”的称呼早已不用了,本书主要使用“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三种称呼。

对待希伯来文化,我国学术界尤其“外国文学”界持有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冷漠甚至鄙视态度,认为它毫无地位可言;另一种是肯定和重视态度,主张其地位非常重要,它和古希腊文学共同构成西方文学的两个书面源头。持前一种态度的人谈到西方文学的根底时,言必称希腊罗马,而绝口不提希伯来。在他们看来,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为主,以上帝为智慧的根源,完全是错误的。在“十年动乱”时期,这种左的思潮发展到极致,简单地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没有任何真理性可言;希伯来文化推崇理想,以信心和幻想为真实世界的远景,那不能成为文化的源泉,不值得一顾。在这种极左思潮影响下,希伯来文化不可能有任何地位可言。

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后,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希伯来文化的地位才逐步得到确认,重新受到重视,和希腊文化处于并立的位置。人们逐渐认同“二希”的重要性,认识到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同为近现代欧美文化的源头,而且后者对东方文化也有一定影响。人们看到希伯来文化、文学在世界文化史、文学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意识到任何忽略、轻视甚至否定其重要性的做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只有确切地了解、掌握希伯来文化,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领会欧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人们认识的飞跃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发展,目前国内高等院校亚非文学教材中大多设立了介绍希伯来文学的专章,研究、评介希伯来文化或文学的专著,如《希伯来文学十二讲》、《古犹太文化史》、《圣经指南》、《圣经鉴赏》、《圣经中的犹太行迹》等,也已经出版。研究、翻译者的队伍从小到大,已形成一个群体。可以

说,对希伯来文化、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现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权威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家们就将希伯来与中国、印度、希腊并列,尊其为世界古典文化或文学大厦的四大顶梁柱之一。中国的闻一多和吴宓等就持这种观点。闻一多先生在1943年写作的名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清楚地

说: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再过几百年,在四处思想都觉醒了,跟着是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的出现。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膊碰上了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上文说过,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四个国度里同时迸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的。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中国与以色列许是偶同,印度与希腊都是雅利安种人,说着同一系统的语言,他们唱着性质比较类似的歌,倒也不足怪。

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代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

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进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1]

闻一多先生认为,四种古老文化的关系清楚明白,印度和希腊所唱的歌倾向于讲故事,近乎小说和戏剧。因为他们都是雅利安种人,语言相类似,唱出性质类似的歌,不足为怪。只是中国和以色列民族唱的歌性质也相似,都是短篇抒情诗,而他们却属于不同人种和不同的语言。

“歌发于言”,“言为心声”,一个民族的歌调如何,主要在于心情思想,而不在于人种和语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以色列人有同有异,两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也互有同异。中国人和以色列人相隔千里,但在思想深处颇多相似之点,如都有勤劳节俭、吃苦耐劳、善于经商的特征。最大的特征是,他们都是早熟的民族,信奉最早的一神教,敬天崇祖。以色列人的一神教是世界上最早的,这是大家共知的;但中国最早的宗教也是一神教——崇天拜祖,属一种原始的一神教,却不大为人所注意。人们常说“穷则呼天”,即人遇到力所难及之事就求救于天。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多数是占卜的文字。国家有大事,如征战、迁徙、建都等,都要向天帝请示是否吉利,如问“哪一天会下雨?”《卜辞通纂》第365片即写道:“今二

月帝不会雨(这二月里,天帝不会下雨)。”

诗在以色列,也和中国一样,一出现就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功能。它一出世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生活。礼乐维护着社会,诗解释着礼乐的意义。大卫作了许多诗歌,又制造了礼乐。以色列民族在诗歌和礼乐的维系、影响下,人民得以团结起来,虽经二千多年的囚居与流亡,仍不失去凝聚力。把中国和以色列相比较,可知诗、礼、乐三者合一而力量无穷。

在四个民族中,中国和以色列虽然空间距离较远,但相同相似之处却很多。以色列自古以来,在与周边大国的接触中,甚至在高压之下,都没有被同化;;流寓在其他国家的以色列人,也大都保持了独特的民族性,但以色列人在和中国的接触中,却在很短时期内便被深深地同化了。开封的犹太人能和中国文化交融,他们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并在中国做官。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希伯来的摩西五经,加以对比,觉得犹太教和儒教教义相接近。他们在开封建造犹太会堂,或称清真寺,寺中有许多匾额和对联,其中一些辞句好像是中国六经中语。匾额如“教本于天”、“昭事上帝”、“钦都昊天”等;对联如

识得天地君亲师,不远道德正路;

修在仁义礼智信,更是圣贤源头。

仰瞻造化天,敢不起恭起敬!

俯拜长生主,自宜洁体洁心。

道源于天,五十三卷,备生天生地生人之理;

教宗于圣,二十七字,得传心传道传学之微。

这些对联语言精辟而简练,足见作者精通汉语和希伯来语,能深刻理解摩西五经和孔门六经,准确判断汉希经文的精华,及其教理的攸同。这证明他们不但勇于“予”,也勇于“取”;亦证明汉希两种文化内在精神的相通。以色列民族最初生活在阿拉伯沙漠的西南

面,公元前3千纪末叶迁居到两河流域的吾珥,吸取了巴比伦的文化。公元前1800年时又迁居迦南地区,与腓尼基民族同居而采纳了它先进的文化要素,特别是它的拼音文字系统。后来又迁居埃及,从埃及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此基础上得到长足的进步。约瑟在埃及贵族中学到不少东西;摩西在法老宫廷中长大,也学到各种治国之术,加上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指导,掌握了在混乱中治国的技巧。摩西的成长道路和以色列文化的成长道路是一致的,和中国文化的成长道路也是一致的。勇于“予”,也勇于“取”,取他人之所长,取其精华而集其大成,终使自己文化的主人公地位得以坚固,最后成为世界古典文化的四大顶梁柱之一。中国的文化同样。中国原始的宗教思想是信“天”或“天老爷”,这是朴素的“一神论”。

到春秋战国时,儒、道、墨三家哲学派别继承了这个思想。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的弟子颜渊死了,他哭着说:“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对宗教的贡献表现在艺术方面,他对诗、礼、乐的结合很感兴趣。《论语·先进》中有个故事,说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人和老师同坐,谈论自己的志愿。子路口快,首先发言,说自己能治千乘大国,孔子听一笑置之。冉有说自己只能治六七十或五六十里的小国,使之自足,至于礼乐等艺术方面的事,只能求教于高尚的君子。孔子问公西华怎样,公西华向来对于礼乐有兴趣,但不敢以“君子”自居,只说愿意学习。最后问曾皙,曾皙回答要带队作礼乐之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水的温泉沐浴,在春风中跳求雨的舞,然后歌咏而归。”孔子叹息着说:“我赞同曾皙啊!”赞赏他踏春时那种从容自然的态度,喜欢那种礼、乐结合的气氛。孔子无心创教,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取半信不信的态度。儒教之立始于他的孙子子思。子思写的《中庸》是儒教第一本经典。他不但尊孔子为教主,并立了教义,上承殷周以来的传统天道观,下效老子的“道”和墨教的组织,确立了儒教的基础。

儒教在汉朝被尊为国教。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光武帝的提倡,至东汉盛极一时。汉代的大经学家如董仲舒、马融、郑玄等大搞谶纬之学,儒教日趋神秘化,到了东汉极盛时,不但孔子变成一个极神圣的通天教主,并且成了永久的教皇。

在儒教之后,道教继之形成。老子谈“天”与“道”,却无意创立宗教,他的“道”只是观念上的抽象物。庄子最先将“天”、“道”拟人化,使“道”成人身而称为“大宗师”,又以老子为“博大真人”,奉之为教主。当时他也只是以诗人的情味去宏道而已,并不打算出来组织教民,号召信徒。到秦汉之际,神仙之说盛行,渐被道家所采用;及至东汉的张陵时,正式有了宗教的形式。张陵(即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造做符书,祷祝刻鬼;后来魏伯阳等继起创服食炼养之说,于是符箓派和丹鼎派并行,交相为用,奠定了道教的基础。

古代传统中信天敬祖的宗教思想到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之后,被儒、道两家继承发展为正式的宗教。儒教的内涵极其丰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可以在近两千年中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利用,也可以被广大平民阶层所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历代文人往往分别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例如,唐代诗人中杜甫主要倾向于儒家,李白则主要倾向于道家。

除儒、道两家外,还有墨家。墨教更适宜于继承传统的信天敬祖思想。墨家的“天志”、“明鬼”、“尚同”、“尚贤”、“兼爱”、“非攻”、“非乐”等主张,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特点,发展了原始的宗教传统。墨子的学说在先秦时和儒、道一样,都被看作“显学”,特别显出宗教的特点,能更明确地实行其教义,去兼爱、尚同、非攻、非乐、节约。但因它在末期受到强有力的压抑和废黜,偏向逻辑的研究,走入抽象学科而忘掉人生伦理和宗教修养,以致经书很少有人去钻研,直到晚清时孙诒让、梁启超等出来,做了训诂上的考释,才又风行一时。吴雷川先生把它比作基督教,但墨教的宗教内容已经为佛教和道教所取代。从东汉到盛唐,佛教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作了道教的他山之石,其组织法、仪式、经典等都为道教徒所模仿。

佛、道二教思想极为接近,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佛道二教勃兴,很快就和儒教鼎立而三,而信“天志”的墨教早已灭亡了。

墨教信“天志”、“明鬼”,比儒道更富于宗教的素质,本应最适于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崇拜天老爷的一神教,像以色列人的犹太教;但它却过早就灭亡了。最大的原因在于“反乐”,不尊重诗歌、礼乐,离开了宗教发展的营养素。犹太教、儒教、道教都因有宗教艺术而能流传并发展。墨教虽有宗教的要素,却没有宗教艺术,所以不幸而短命。

世界上四种古老文化和文学差不多同时出发以后,相互发生过影响,对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影响有两次。第一次是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和戏剧,第二次是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和戏剧。第一次受到印度影响后,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一次文学形式的变革,就是南宋、元、明小说和戏剧的兴盛。第二次受欧洲文学的影响后,再次产生文学形式的变革,就是五四以来小说和戏剧的大发展。

过去,我们曾勇于“予”,也勇于“取”;今后不仅更要勇于“予”,也更要勇于“取”。在第二次来自欧洲的影响之下,国内文坛出现了欧化的句子、章法、故事和悲剧的结构。句子的欧化是可笑的,但也可见当时爱好新事物的真切情感。现代化是人类进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要学习以色列、印度、希腊的一切先进的、有用的文化,学习世界上各国先进、有用的文化,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第二节 希伯来文学史鸟瞰

希伯来文学史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指希伯来人所创造的文学历史;二是指用希伯来文创造的文学历史。也就是说,希伯来文学史是希伯来人用希伯来文创造的文学历史。

希伯来文学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希伯来文学史的第一阶段是古典文学时期,时间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2世纪上半叶犹太人进入流散时期。这1000余年的作品以《希伯来圣经》为主,还有《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等,大体可称为圣经文学时期。这时期的文学是希伯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圣经》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录,以宗教信仰为主,被用为民族团结的纽带。在长达1700余年的流散生活中,古代希伯来语几乎成为僵死的语言,只是由于《圣经》的流传,还能依稀存活于现代犹太人的口头。所以,19世纪有识之士开展恢复古希伯来语运动时,很快就成功了。活拨生动的《诗篇》又能琅琅诵读于现代人之口。

《圣经》文学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首要代表,是该民族生活状况和思想发展的生动记录。《希伯来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总集,共39卷,分为3大部分:一、律法书,二、先知书,三、诗文集。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摩西成长于埃及法老的宫廷中,学习了埃及的古典文化,约40岁时觉察到自己的民族处于奴隶地位,决意领导希伯来人摆脱为奴之境。从80岁开始,他带领同胞出埃及,在旷野中漂流40年,立法,立教,创立未来国家的基础,在约旦河东岸遥望迦南富庶之地,预定在那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按传统观点,《圣经》的头五卷,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等,称为“摩西五经”,是摩西的著作。《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期先知没有著作留传下来,他们的言行记在历史书如《撒母耳记》上下卷、《列王纪》上下卷中。著名先知如以利亚和以利沙等的事迹、言行都记载在这些书中,没有单独的文字留传。后先知书分为大小两类,篇幅较长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称为大先知书,篇幅较短的《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哈该书》等称为小先知书。起初犹太人把12卷小先知书辑为一卷,名曰《十二小先知书》。先知书最初大多是口头演说,后经记录和抄写传于后世。它们多半出于先知的义愤,对统治者或富有阶级剥削压迫穷人表示不满,特别是对孤儿寡妇的不幸和苦难

发出义愤。所以,先知往往被当权者看作眼中钉,很多被他们杀害,如耶利米遭石砸而死,以赛亚被锯腰,成为人民的烈士而终其一生。先知文学是希伯来文学中的明珠,先知是人民的圣贤,是极有天赋的诗人。诗文集是犹太人历代文学作品的汇集,有宗教抒情诗集《诗篇》、痛悼民族沦亡的《哀歌集》、世俗情歌集《雅歌》,智慧文学《箴言》、《约伯记》、《传道书》,小说《路得记》、《约拿书》、《以斯帖记》,和启示文学《但以理书》。

《圣经》的前五卷,习惯上称为“摩西五经”,后来又加上《约书亚记》,统称“六经”。关于六经的编纂,德国圣经学者威尔豪森(1844—1918)等人提出“J、E、D、P 四底本说”,认为它们编订时应用了 J、E、D、P 四种主要的早期文献。

“J”是“亚卫本”的缩写,约公元前 900 年写作于南国犹大。该本称神为“亚卫”(Jahweh',又译耶和華、雅赫维等),故以 J 简称。特点是出现得最早,最接近民间口头创作,文字生动流利。

“E”是“艾洛希姆本”的缩写,比“J”迟写 100 多年。称神为“艾洛希姆”(Elohim),写于北国以色列。其中根据北方的传闻,对以色列民族史的记载与 J 本有所不同,例如,关于征服迦南是怎样开始的,就有不同的说法。

“D”是“申命记本”的缩写,写于南方犹大国王约西亚改革期间(公元前 622 年左右)。“D”是希腊文 Deuteronomion(原本《申命记》)的简称。又称“D 典”或“申典”。它假托摩西之名颁布摩西的三篇讲演,重申律法,劝诫族人恪守盟约,一心事奉上帝。主要特点是突出申命记派的一神论观点。

“P”是“祭司本”的缩写,由先知以西结的门徒们于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在巴比伦编成。“P”是德文 Priestercodex(“祭司经卷”或“祭典”)的简称。该本的特点是文字风格比较庄重,注意家谱和祭司礼仪的各种规定。

上述各底本成书后历经多次汇纂,先编成 JE 本,再编成 JED 本,最后,约于公元前 5 世纪中叶编成 JEDP 本,即传世的六经